

感知与洞察： 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Perception and Insight: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in the Practi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大社会学·教授自选集系列

杨善华 著

感知与洞察： 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Perception and Insight: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in the Practice

杨善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知与洞察：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杨善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北大社会学·教授自选集系列)
ISBN 978-7-5097-3192-5

I. ①感… II. ①杨… III. ①现象学：社会学—文集
IV. ①B81-06②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0513 号

北大社会学·教授自选集系列 感知与洞察：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著 者 / 杨善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192-5

定 价 / 49.00 元

印 张 / 19.5

字 数 / 337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这本书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大约是去年，谢立中教授找我，说是系里准备给社会学系的教授们出自选集，我因此也获得了这个机会。虽然自己在社会学系也已经工作了20年，不过因为一直是在从事教学与研究，也没有可能对自己的学术之路作一个详细的梳理与回顾，如今谢立中教授这样一个提议，对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机遇，这无疑是系里对我们这些老师的眷顾，感念之情亦由此而生。

回顾自己执教北大社会学系20年的经历，在学术方面的探索大致落到三个方面：教学、研究与学生培养。其中教学又是与学生培养连在一起的。进入21世纪之后，我跟学生闲聊时说过我给自己退休之前定的目标是三个：（1）完成一个教学实验，这就是以培养与提升学生的学术能力为目标的教学实践（包括授课与社会调查）；（2）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即将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所倡导的积极认知与意义探索贯穿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作为考察的对象，同时又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坚持历史社会学的广阔视野，力求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本真”一面的认识与把握；（3）带出一支研究队伍——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实践以及制度化的规范训练，培养出以自己的学生为主体的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研究团队。应该说，在这三个方面，都还不能算是一无所获。

所以这本自选集所收的论文，基本上也体现了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和成长。读者可以看到，我在目录中把论文分成“理论探索”、“城乡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婚姻家庭”与“教学与学生培养”四个部分，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还因为我从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体会到，社会学的各门分支学科，或者说对学者个人而言的不同研究领域其实都是相通的，因为说来说

去，社会学的各门分支学科都要和“人”打交道，都要以“人”为研究对象。而社会则是通过人的观念和意识、通过人的行动呈现出来的。因此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治学者不可或缺的素质。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提醒我们在治学中切不可自我封闭。我在《城乡日常生活》前言中曾表达自己这样的观点：“学术是没有止境的。”这是因为学术是个大海，个人在学术面前永远是渺小的，即使是再伟大的学者也不可能穷尽学术。所以我们对学术永远要敬畏，这样才能永不自满，虚怀若谷，不断学习一切对自己的学术成长有益的东西。

收入文集的论文，既是自己探索轨迹的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这个研究团队的集体智慧。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有些合作的论文收入的原因。当然，因为毕竟有着著作权的问题，所以我坚持被收进文集的合作论文必须至少是我执笔完成初稿和最后定稿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向我们这个研究团队以及我的合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没有大家互动中的相互启发，没有田野调查中每晚的集体讨论与回校之后的总结，没有同学们辛辛苦苦又一丝不苟地将录音整理成书面文本，文集中许多论文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我的学生吴青阳为文集最终交稿做了很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杨善华

2011年8月19日

| 目 录 |

第一篇 理论探索

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	
——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3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7
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22
田野调查中被访者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	33
日常生活：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切入点和	
不可或缺领域·····	44

第二篇 城乡社会发展

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	51
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	
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	65
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77
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	89
面对 SARS 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101

农村村干部直选研究引发的若干理论问题·····	103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	115
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的解读·····	126
体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138

第三篇 变迁中的婚姻家庭

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	
——对中国农村的一个跨（亚）文化比较研究·····	149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160
21 世纪的中国人	
——家庭·····	168
改革以来我国大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格局的变化·····	174
中国近年来家庭结构与婚姻的变迁·····	191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	
——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207
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	
——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探·····	238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	
——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247
家庭社会学研究三十年·····	259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	267

第四篇 教学与学生培养

现象学的路径与学生能力的提升·····	281
教师在讨论课中的主导作用·····	286
“意识”、“见识”与教学过程中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一个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	290
《城乡日常生活》前言·····	297
平和心态、开放胸怀、锲而不舍·····	303

第一篇 | 理论探索

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

——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女性研究的肇端开始算起，中国的女性研究迄今已有将近 25 年的历史。这 20 多年的研究虽然在认识作为一个社会基本群体的女性，并进而用社会性别视角去揭示社会对男女两性的形塑，从而构成了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批判与挑战这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大多数学者首先是从自身遭际出发去从事女性研究，这就使她们的研究会对自身所属的女性知识精英群体所感受到的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而事实上，由于社会以及人们的社会存在、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我们不能不将性别因素与种族、阶级等因素交叉起来考虑（孟宪范，2004：5）。简言之，女性除了性别标识之外，还有社会标识，她们中的每个人其实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阶层中，这也会导致她们的性别意识的差异。

因此，女性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全方位的（即应该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但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女性人口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这样的妇女既非政治精英，也非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但却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妇女运动史看，她们固然被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所形塑，但一旦觉醒，必定是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而她们的思想轨迹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 1949 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如果说从事女性研究的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或者说是女性个人自主性的有力倡导者，那么她们也并非“后知后觉”。因为她们有着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

的空间；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因此，她们的生存状态才首先是女性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实际”。很明显，只有认识和理解她们，女性研究才能真正扎根于中国本土社会，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社会关怀，才能获得长久的文化意义上的生命。

当我们在对女性作全景式检视的背景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样的群体，关注她们的生存状态，关注她们的意愿、利益和要求，努力去理解她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意义以及她们话语和行动的意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普通妇女的研究回到了方法论的起点：思想和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客观实际“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回到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一个方法论的重要立场：必须注意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区分。如果从定性研究的立场来看，那么只有在参与式的经验研究中我们才能实现这样的区分，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客观的”，才能帮助我们发现“事实”。

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普通妇女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意义，理解她们话语和行动的意义并在这两者相连的基础上给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解释，就与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同义”。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按普通妇女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而不是按我们研究者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这样的理解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设身处地式的“换位思考”，是“投入式”的理解和与当事人“同感”的解释。当年，马克斯·韦伯在提出自己的“理解社会学”的时候，他只是认为人的行动之所以可以被理解是因为行动者所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如果站在现象学社会学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普通妇女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其实是“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探寻这样的意义并加以中肯准确的解释正是现象学社会学的任务。因此，理解普通妇女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构成了观察的前提）及她们的话语（它的书面形式即为文本）同样是必需的。

等到我们真正进入普通妇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她们生活的平凡，这种平凡就如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定义：重复，单调；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即使是类似生老病死这样的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似乎也与他人雷同。但是，这正是普通妇女生命历程的特点，是她们的共性。而且，只要揭开这

样的表象，我们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这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们自我或者人格的形塑与再形塑是在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就是我们在探寻这种意义的时候首先要从了解妇女的“生平情境”^①开始的原因），因此，她们对自我的定位不可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制约。这样，当她们认识自己的时候，首先把自己看作归属于某个群体的女性，而且出于社会竞争的考虑，在可能的时候也希望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社会地位相对更高的群体中的成员（至少是不在最底层），这自然会使她们的人生目标与一定的社会价值相联系。其次，她们与他人及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一种符号的互动，这样的符号必然承载着意义。同时，在她们能动地适应或者改变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她们也赋予了社会环境一定的意义。因此，对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妇女来说，她和他人交往时的行动和言语都有着很强的主观意图，而按韦伯的说法，这样的主观意图就是主观意义，是可以被理解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普通妇女也是社会中的人，她们的生命历程其实是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轨迹交合的，因此，只要我们将她们的个人生命历程放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她们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如遭受压迫、参加革命、结婚、就业等）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从而使这样的理解获得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普遍性，也使得在这样的理解的基础上给出的解释可以获得社会学层面的充分的社会意义。而这样的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避免了现象学社会学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解那种“去历史化”的缺陷。

这样，从“意义的解释”这一方面去理解普通妇女，理解她们的观念和行动，理解她们的“生活世界”，就给了我们在“不失真”前提下对此作出理论概括的可能。显然，这样的理论概括必然来自“纷繁复杂的经验事

① 这里的“生平情境”借用的是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的概念。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开始起通过自身的经验与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获得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应付各种事件及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由日常语言和方言的命名而类型化。对个体来说，这样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知识自童年时代始不断积累，把这个世界既作为现存对象来接受，也作为具有过去和未来的对象来接受。这样的类型化知识和他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成为经验储备；后者即是他此后理解社会现象、采取相应社会行动的基础。另外，由于个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由特定的人群哺育起来的，他因而具有特定的欲望、兴趣、动机、性格、抱负以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所以，由这些经验和知识构成的经验储备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舒茨称之为个体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在这里，“生平”系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霍桂桓，1996）。

实”，也必然是位于“中层理论”这一层次的，因而也是能够包容和体现现实世界中普通妇女的生活的生动和丰富的。显然，这将为女性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并有助于拓展女性研究的理论内涵，提升女性研究的理论层次。

（原载 2004 年 11 月 23 日《光明日报》）

参考文献

霍桂桓：《舒茨》，载苏国勋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 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一 问题的提出：“深度访谈”的实质

“深度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方法，在目前的社会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深度访谈，学界所指的主要就是半结构式的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Hakim, 1987; Arksey & Knight, 1999; Tom Wengraf, 2001）。汤姆·文格拉夫（Tom Wengraf）提出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量改进，但只是改进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整体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joint production）”；它的第二个特征是“要深入事实内部”（Wengraf, 2001: 3）。

关于第一个特征，文格拉夫指出，访谈员事先所准备的访谈问题必须要具有开放性，在访谈中，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和随之而来的问题都是研究者预先无法计划的，因而，访谈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和理论化的方式来加以改进”（Wengraf, 2001: 5）。这一特征已经成为关于深度访谈的基本共识，也是我们对访谈的基本主张之一。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能试图去确定和提出每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具体问题，甚至也不能够事先确定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在事先的准备过程中，“半结构式的访谈应当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访谈员应能够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并在同

* 此文是我们课题组集体多年实践的结晶。在此，首先要感谢课题组的刘小京、程为敏和罗沛霖教授以及彭钢旎、宋婧等同学，文中不少观点来自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参加调查的同学们的发言。他们对此文的产生贡献良多。

时探究意义以及出现的兴趣领域。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要渴望听取被访者的叙述。但访谈员也要注意改进问题，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Arksey & Knight, 1999: 7）。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访谈员足以将谈话导引到感兴趣的题目上，深度访谈还是会为被访者提供足够的自由，他自己也可以来把握访谈”（Hakim, 1987: 27）。

但是深度访谈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它的第二个特征，即所谓“要深入事实的内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何谓“深度”？一个是如何能够深入事实内部？关于“深度”，文格拉夫提出了两个方面：①“深度”了解某事乃是要获得关于它的更多的细节知识。②“深度”指的是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以及“表面事实”（surface appearances）是如何极易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Wengraf, 2001: 6）。

文格拉夫强调了更为丰富的细节知识和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深度访谈之“深度”的全面解析。如果考虑到格尔兹所强调的“深描”（格尔兹，1999）就会发现，文格拉夫并没有关注访谈员在深度访谈中所遭遇到的舒茨所谓的两个世界的问题（Schutz, 1976）。换句话说，所谓“深度”的问题，是与如何达到深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而深度访谈的实质，并不是仅由对待“深度事实”的态度所构成。如果不对深度访谈的具体方法做详细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也很难达到访谈的目的。

格尔兹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应该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概念系统来完成的。换言之，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格尔兹，1999: 18）；然后再将所得到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所谓深度的事实，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

对于深度访谈的态度直接由对待定性研究的态度决定。在访谈当中面对叙述者的时候，我们想获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凯瑟林·哈克姆（Catherine Hakim）的观点：“定性研究关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的表述（accounts）……定性研究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解释都归之于自我指向（self-directing）的个体。但是人们关于情境的自我定义是任何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即使它没有提供完整的表述或者

解释。”(Hakim, 1987: 26) 被访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的所有表现都是研究者观察的对象, 并且是后者研究资料的来源。就意义角度而言, 这就又回到了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 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 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 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 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① 访谈资料既然来自被访者的叙述, 那么这样的资料一定也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意义的 (或者根据我们深度访谈的实践可以这么说, 这是经由被访者主观建构的叙述), 因此, 一般说来, 对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的意义理解和解释。我们要理解并给出解释的则应是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 (话语) 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这些资料的意义, 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此外, 我们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 因为这样的场景同样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某种意义的, 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

我们实现研究目的的前提在于对这种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于此, 我们进一步认为, 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 诸如动作、表情, 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 (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取资料的过程中, 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我们应该在行为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行为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罗沛霖、刘小京、程为敏, 2003)。这也符合韦伯的原意, 也就是说, 对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放置在行动者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 但同时也要注意明确区分研究者与被访者: 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 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舒茨将各个有限的意义域称为各意义世界, 进入社会科学的世界意味着, 放弃自然态度, 成为价值无涉的观察者 (disinterested observer), 同时具备了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意义关联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 那观察如何可能? 即使论域限定在访谈

① 虽然后来舒茨对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 (详见 Schutz, 1972), 比如认为韦伯没有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 意义在自我、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 等等, 但是从我们的经验研究的实践看, 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作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深度访谈的实质的出发点。

之中，问题也同样存在，研究者如何首先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舒茨认为，“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向”（Schutz, 1962: 158）。社会科学的观察者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即使是在访谈类的观察中，也非如此不可，尽管访谈的特征是双方的互动。因为访谈一旦发生，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要完成一个从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世界到社会科学世界的跃迁，就必须将自己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并将自己的目的动机限制在如实地描述与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世界中去”（Schutz, 1976: 17）。所以，如果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单一”身份来进行访谈，就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完成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同时，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作为常人的世界——不同于被访问者的世界。研究者必须要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

因此，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①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而这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持与被访者之间的疏离关系的基础上，来获取足够“深度”的知识？访谈又应当如何展开呢？阿科瑟（Hilary Arksey）与奈特（Peter Knight）提出了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应的一种访谈方法，称之为“渐进式聚焦法”（progressive focusing）。这种方法是从一般化的兴趣领域入手，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集中展开。因为在访谈中，被访者会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在访谈中，这种半

① 意义的探究是现象学和诠释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在这里回避了意义的探究为何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它的解答涉及人的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一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为本文之力所不逮，因而本文只将如何在深度访谈过程中进行意义的探究作为主题。于此，我们还要申明的是，虽然我们强调在访谈开始时研究即告开始，但是这并不排斥在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探究，对于研究而言，这同样是必需的。